

行为、制度与经济研究的新视角

——基于广虚框架下行为程序化决策 与非程序化决策的思考

靳涛 黄信灶 李帅 梅伶俐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厦门 361005)

摘要：人类的决策行为具多面性，基于理性选择的程序化决策没有错，而基于非程序化决策的选择也没有错，它们只是可能适合于不同场合的决策罢了。程序式决策主要靠逻辑、运筹、数学和工程等具体分析方法，定量描述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效果。而非程序化决策可能更多靠经验—判断—满意原则来应对经济现象和过程。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可以认为，程序化决策分析方法更适合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和模拟的最优化问题，而非程序化方法更适合分析特殊背景的瞬间决策问题和复杂的变化中问题。当然，程序化决策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只是这种简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它在某些时候也需要有另一种分析范式来适时地补充。

关键词：行为；制度；经济研究；程序化决策；非程序化决策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4) 03-0013-08

A New Perspective on Behavior, System and Economic Research

JIN Tao HUANG Xin-zao LI Shuai MEI Ling-l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Human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with versatility, decision based on the rational choice of the programmed decision is not wrong, neither the limited rational choice. They just may be suitable for differ-

收稿日期：2014-03-17

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X2012-1003 (Y)]；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29)资助。

作者简介：靳涛（1965—），男，山东嘉祥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问题》副主编，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房地产经济学。

ent situations that decision. Program type decision depend mainly on logic, math and engineering concrete analysis method, is to local or short-term economic activity analysis method,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accurately mathematical formula,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effect. The im-programmed decision may be more depend on experience judge- satisfaction to deal with economic phenomenon and process. In fact the two are not absolute opposition, general speaking, programmed decision analysis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analysis simple induction and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problem, im- programming method more suitable for analysis of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decision problem and complex change. Of course, programmed decision is simplified to reality and abstract, just this simplified and not in any case is effective, it also need and another analysis supplement.

Keywords: behavior, system, economic research, programmed decision, im-programmed decision

前言

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经济人”理性假设。然而，一些行为经济学家却研究发现客观现实并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的假设，现实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理性最优化模型来解释。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如“阿莱斯悖论”^[1]、“股权风险溢价之谜”^[2]、“羊群效应”^[3]、“偏好颠倒”^[4]、“满意原则”^[5]等。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的行为会以某种系统的方式偏离理性，非理性行为可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总的来说，人类的行为本身是多层面的，基于理性选择的程序化决策没有错，而基于非程序化决策的非理性选择也客观存在，它们都是人们决策行为的不同侧面，可能适合于不同场合的决策罢了。

一、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程序化范式的质疑

二战结束以后，运筹学、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发展很快，特别是管理科学对组织理论的行为探讨日趋成熟。20世纪中叶，爱德华(Edwards)首先提出将行为决定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并确定了研究的程序，而西蒙(Simon)^{[6][7]}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方法。西蒙认为，人类理性行为的最大限制就是人类的知识是不完备的，一个人对于自己行为的了解都是零碎的和片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根据他以往的经历来推断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西蒙认为，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要

完全了解每项选择的精确结果，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比方说，为了成功地应用现有资源来彻底解决城市的灭火问题，消防队员必须详细了解该城市每一个分区(实际上是每个建筑物)发生火灾的概率，以及管理程序的任何变化或灭火主力的重新安排对火灾损失的确切影响。通过采用这种形式来说明这一问题，就是承认人类的完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知识缺乏的限制。如果消防队员在每次火苗出现时就收到报警，火灾损失就会大大减少。正是因为达不到无所不知的境界，消防部门才必须投入相当大的气力，通过特别警报系统以及其他方式获得关于火灾形势的信息，尽可能迅速的采取救援行动。^[8]

西蒙形象地说，构思人们的行为模式也需要人们的想象力。一般来说，一个受体力和生理要素影响的人在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完成的动作是多得不可思议的。西蒙打比方说，一个人有两条腿、两只手、一个头、两只眼睛、一个脖颈、一个躯干、十根手指、十个脚趾以及许多控制这些器官的肌肉，每个部位都能单独或协调地做出复杂的动作。任何时刻，我们都只能想出非常有限的几个可能动作作为备选行为方案。由于每种备选方案都有各自独特的结果，所以许多可能结果集根本无法进入评价阶段，因为人们还没认识到它们也是备选行为方案的可能结果。虽然，人类的理性能力要比其他动物强得多，在某些领域，人们开发出许多相当有创意的方法，人们还发明工具和进行技能培训等工作，而这所有的一切，也只不过是扩大了人类可行方案的选择范围。^[9]

一般来说，可以认为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家丹

尼尔·卡尼曼^[10]和他的合作者阿莫斯·图斯基共同创立的。丹尼尔·卡尼曼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1]。由于卡尼曼是一个心理学家,行为经济学源于心理学试验的逻辑思路也就很正常了。行为经济学就是在人类心里活动的试验基础上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主流“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置疑。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人们有时会在微不足道的风险面前止步,而同时又会为一些虚无飘渺的目的而进行疯狂的赌博。从一个人在对一生计划的安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尽管人们都会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长远的预期,并会按照预期来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and 金钱,但实际上能做到理性安排的人几乎没有。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会什么事都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理来行事,然而事实上,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这样做?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对如何获得幸福都是一无所知。另外,微观经济学对人都是自利的假设,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和利人的一面,如父母为孩子的奉献,人们为希望工程、慈善基金、生活困难人以及街头乞丐的捐款等等,这些付出都无需回报。而主流经济学却对此视而不见。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研究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理性的假设存在出入。他们的试验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不可能对所有情况都有详细的分析。在这些情况下,人类通过经验和记忆来判断和决策是很有启迪的。他们发现小数法则是这个时候人们遵循的主要原则。他们的试验发现人们的行为决策与概率论中的大数法则存在出入。卡尼曼等人的研究的发现,“人们更倾向于明显的或便于记忆的信息(Tversky 和 Kahneman, 1973),认知心理学的一个一般发现是,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便于记忆,也相信其更加真实、相关。这样,熟悉和有效就对精确和相关起到提示作用。因此,媒体中某些信息极少重复,如果不考虑精确性,人们就会更容易认为其有效并因此而产生错误认识。这一人类判断的证据表明,人们的推理向概率论的基本法则提出了系统挑战。卡尼曼的研究阐明了这一点,向传统经济论基础之一

的经验有效性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质疑。”^[12]

二、行为、制度与决策

一般来说,通过回答问题、形成判断和做出选择思维过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做出决策意义巨大。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关于不确定条件下决策行为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目前,卡尼曼已经成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对包括人类学、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李增刚, 2003)。美国经济学家卡瑞(Cory)也认为经济学必定是建立在行为科学——大脑如何工作——的坚实基础上的(Cory, 1999)^[13]。

一般而言,经济学认为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理性判断和决策。长期以来由于有关心理、情绪方面的研究是和“理性人”假定相冲突的,这些研究成果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不以为然。但行为经济学依靠认知心理学分析法,在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实验经济学所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卡纳曼就是以人们决策不确定性为分析前提,与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的经济行为。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14]等。卡纳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15]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省几个美元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一些钱(汽油费等)。^[16]

行为经济学针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行为经济学告知我们,人类的行为会以某种系统的方式偏离理性,因此非理性行为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总的来说,人类的行为本身实在是很多面的,理性选择也好,非理性选择也好,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些不同的侧面,人类的行

为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之一面,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选择罢了。

实际上人的行为还与社会的习惯和制度关系密切,美国的制度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Allan A. Schmid)在谈到制度经济学与行为的关系时说道,“制度经济学包括经济性、权力与知识三个层次的分析。经济性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制度更有效? 权力分析回答的问题是在经济性的规程中谁的偏好更重要? 谁有什么可以交易? 哪个制度更为有效地满足谁的目的? 知识分析回答的问题是偏好和目标如何形成? 技术与制度如何变化? ……制度经济学是厂商理论与政府分析的补充。制度经济学对政策分析的影响更大。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选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生产经济学则关注行为与产品及服务产出之间的联系。”^[17]

斯密德在《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认为,制度与行为是不可分的,因为各种描述大脑工作方式的变量与步骤的有效模型为人们的各种决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面既有大脑的判断,也有人们的决策习惯影响。他认为,对于经济学来说,大脑是一个具有感情和感觉的可估价系统、行为规律影响制度的绩效、大脑是一个开放系统等几方面的存在都会导致“理性人”模式的偏差。他还认为,认知局限性导致人们形成能够通过适当形式度量的次要目标,这些度量形式说明了利润、市场份额等程式化方法的作用。“即使这些度量仅仅是假定要度量的事物的粗略估计,它们也可能取代决策过程中的‘真实’而不可度量的概念”(西蒙,1991; 斯密德,2001)。

从制度经济学的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些来自非主流的演进观点和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的进化博弈分析和各种学习模型纷纷被引进到制度分析中,可以认为制度经济学越来越走出“理性人”框架的趋势非常明显。当然,以威廉姆森为首创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关于企业和组织的分析中更是这样,如威廉姆森明确地认为,他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之上的。

人类是有限理性的,人类的行为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这主要是因为,不确定的复杂的决策环境的影响;知觉上偏差的影响;决策时间及可利用资源的限制等会影响到人类理性的限度和人类的决

策过程。在有限理性机制引导下,人类理性第一层次的作用是搜索有用的信息;其二就是寻求满意解。信息处理理论也认为,在现实社会的问题求解就是首先在往往非常大的问题空间中,进行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搜索,由于以经验规则或“启发式法规”为依据的选择性,可以把搜索引导到有希望获得答案的区域去进行,因此,一般只搜索全部问题空间的一小部分,就能找到相应备选的问题的满意决策答案。这样就可以进而在第二层次确定满意答案,此时,寻求满意式的准则就起了作用,这也就是满意原则的决策过程。其实在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分析和制度演进的分析中,制度经济学所遵循就是建立在人类行为分析基础上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

在现实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中追求“满意”而不是“最优”,是因为在变迁之前,没有明确可供实施的方案来选择,人们也不可能预先确定哪一种方案是优选的最佳方案,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最优化选择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分析框架中是不成立的。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之上的逻辑思维主要是在太复杂的实践面前,忽视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把许多重要的影响因素忽略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该理论下的分析自然不可能取得满意的结果。

在制度经济学的组织理论研究中把行为原则作为制度分析的基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组织中的个人也会理智地努力提出个人目标,它可能不完全与组织目标保持协调一致,常常还会与组织目标背道而驰。此外,组织中的个体和群体往往会争夺权力来实现各自的目标,维持各自的组织观点。要理解组织,我们必须考虑理性的各种形式和目标,也必须考虑人类的自私心理和争权夺利的情况。在组织中,人们说某人行为不理智,通常意思是说,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他们行动的结果是无效的;不完全的信息忽视了他们自己行动的后果;他们的情感蒙蔽了他们的判断力从而使得他们只关注短期目标,其实这本身就说明在组织中人具有有限理性的本质。组织结构本身就是组织要处理的任务的一种再现模式。

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或企业内部的活动分析也应该按人类行为的特点分成两种情况分析,即应该分为为经常性的和非经常性活动两类,前

者的决策可以看为程序化决策,在决策简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最优化决策来解决;而后者的决策则是为非程序化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多方案的比较,当然“理性人”的“最优原则”和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在此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日常的活动不管如何复杂都可以分解为最简单的行动步骤,加以程序化,此时,用“经济人”理性最大化模型是适合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行为原则不仅是经济学应该遵循的原则,它也是制度分析的重要原则,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决策与行为和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三、程序式决策与非程序式决策的融合

科学的方法论强调历史与理论的统一,既反对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抽象,又反对脱离理论单纯的历史和现实的描述。经济学自把人类决策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一天始,就已命定,经济学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学、数学,它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美学,它是对人类心灵和行为永无止境的求索。^[18]行为经济学认为,主流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我利益。但现实社会的人也有情感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方面。实际上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19]

西蒙用心理学中流行的过程理性概念来反驳实质理性(最大化理性)概念,后者统治了传统经济学,为它提供了自己的结构决定论程序。西蒙描述了经济学长期以来至今所关注的对象,环境的变化迫使这一学科开始关注过程理性的过程。针对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这种逐步变化,即要面向不确定的信息,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替代性方式:一种涉及经济学的直接“心理学化”,即经济学对行为主义研究思路的明确采用过程理性方法;第二种情况则是经济学家从运筹学和统计决策论中借用最优搜索和计算效率的概念,并将对计算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广泛地引入

理性模型。从实质理性理论向过程理性理论的转变需要科学风格的基本转变,从对严密的公理系统的演绎推理转向对复杂思维算法的详细实证探索的追求。毫无疑问对经济学家来说,后一种风格的不适应影响了这种转变的过程。实际上,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这两种思维方式可能各有利弊。

经济学关于企业或企业内部的活动分析也应该按人类行为的特点分成两种情况分析,即应该分为经常性的和非经常性活动两类,前者的决策可以看为程序化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仅靠最优化的运算就可以解决;而后者的决策则为非程序化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多方案的比较,当然“理性人”的“最优原则”和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在此情况下都是有效的。日常的活动不管如何复杂都可以分解为最简单的行动步骤,加以程序化,此时,用“经济人”理性最大化模型是不适合的。

主流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设个体是理性的,即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关于人类理性的假定直接影响到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方式的差异。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都非常重要,福柯曾经说过:“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是什么?”^[20]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是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W·威尔士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演讲时说道,“在关于理性的哲学中,有一个谜。在传统上,理性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级的能力,是哲学的核心。例如,亚里士多德赞美理性是自我认知(noes is noeseos)。而现在,许多哲学家都想脱离理性。费耶阿本德宣称“告别理性”起到了范式的作用。如今人们不像从前那样给理性以最高的赞赏,而是鼓吹抛弃理性。”^[21]目前演化经济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也说明经济学过分倚重理性分析可能是有些过头了。当然,经济学家不应该完全抛弃“理性”,但起码我们要像马歇尔那样知道,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思路,“工具理性”外,还可以从演化的角度来分析经济问题。

其实,从目前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在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的视角将推动各种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开展更具有批判和建

设性的对话。这种多元视角的融合能对各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做出更深入和更符合现实的解释。……经济学学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对经济行为更健康的各种跨学科的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开放。”^[22]

如何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中，合理定位这两种研究范式是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并非是彼此完全对立和水火不容的，他们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经济问题互相补充。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把前一种研究范式称为经济学主流研究范式，但有些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如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在其《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我相信制度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前沿，正如那些定位于制度研究方向并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如阿克洛夫、阿莱克斯·阿罗、布坎南、科斯、哈耶克、卡恩曼、库兹涅茨、缪尔达尔、诺斯、森、西蒙、斯蒂格利茨，以及那些对制度与行为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的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问题。”^[23]

其实就目前来看，关于这个问题青木昌彦教授对上述两种研究视角的互补与融合已给出了一个好的运用。如青木昌彦在用博弈论进行经济分析时，按对博弈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不同，把博弈模型分为古典博弈模型和进化博弈模型。他认为，古典博弈模型（以“完全理性人”为基础的演绎逻辑）适合于分析诸如规范、合同和治理结构之类的可自我实施性问题；而进化博弈模型（一种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分析框架）则适合于分析以惯例和习俗形式体现的制度的自我实施性（青木昌彦，2001）。这两种模型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在一些情况下，两者甚至在同一域导致相同的模型解。青木昌彦在用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制度演化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古典博弈模型（子博弈精炼均衡），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古典博弈模型在分析问题时也还是有效的。在青木早期对日本企业和银行制度的研究中主要是通过古典博弈模型来分析；而在后期对习俗、惯例等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分析中主要是运用后者来研究。

总的来看，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按对主体假定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

性的不同，把分析框架分为程序化决策框架和非程序化分析框架。前者适合于分析资源配置优化、市场结构、增长模式、最优契约等静态和准静态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而后者则适合于分析人类社会经济变迁、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经济模式差异、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动态和更复杂问题。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大都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模型本身具有解释力才是重要的。其实这种观点在研究人类社会长期经济演化时是错误的。因为用简化的静态模型是无法分析动态变化过程的，简化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意味着谬误，这种方法论的缺陷早就被凡勃伦、哈耶克等人批判过。后者的适用范围更广，特别是针对一些复杂问题时更为有效。

另外，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能给我们带来某些启迪。我们知道，经济学中的实验室实验，最早来自于对产业组织的研究。如张伯伦（Chamberlin，1948）最先发表了市场实验方面的论文，他要描述和刻画“纯粹的”但非“完全的”竞争市场的行为特征。目前，实验经济学研究结果清楚地证明，市场制度和惯例能影响市场绩效。传统归类为市场结构方面的变量也被证明是重要的。而且，通过相当标准的数学模型可以把握许多可观察到的行为。

林毅夫在谈到经济学方法论时也提到，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他还强调，如果条件是模型特定的或问题特定的，此时一般性的经济理论能运用的范围就很局限。如用社会性质来解释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存在，就属于问题特定的条件，此时，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社会文化结构都是经济分析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素。^[24]

结束语

程序式决策主要靠逻辑、运筹、数学和工程等具体分析方法，是对局部或短期经济活动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用精确地数学公式，定量描述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效果。理性人决策下的程序式决策反应的是

抽象人的决策。而非程序化决策可能更多靠经验——判断——满意原则来应对经济现象和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更多情感的真实人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可以认为,程序化决策分析方法更适合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和模拟的最优化问题,而非程序化方法更适合分析特殊背景的决策问题和复杂的变化问题。当然,程序化决策是对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只是这种简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它也需要又另一种分析范式来适时地补充。

当前,在世界各国学派林立,“新”论点、“新”学说不断出现。各个学派和各个学说都是既对立又补充,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学说和学派中,它们的主要冲突基本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分析原则的态度,在经济分析中,是坚持“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还是坚持有限理性的“行为人”原则,都是存在争议和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但我们对此的看法是要做到就事论事,对待不同的问题可能要用不同的原则和分析框架,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些分析框架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也是可以相互补充和取长补短的。实际上两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有限理性下的满足感是人们在现实中

无法实现“理性人最大化原则”下的近似原则。这实际上是和物理学中的理性状态与现实状态的差别是一致的。现实状态下的结论并不能说明理想状态下的谬误,现实状态可以认为理想状态的假设扩大与放宽。

目前,广义虚拟经济认为人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制于人的经济效用最大化,而是受制于人的综合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人在决策时,人的效用满足感是超越金钱的。这看起来似乎与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不一致,实际上这也是对理性人假设的放宽和向真实人的进一步贴近。实际上,在现实中人们在决策时考虑和关注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幸福感和满足感等多方面。主要是经济学抽象分析中对于感情和满足的东西由于无法衡量,而金钱由于比较容易衡量,这样主流经济分析只从金钱方面来反映人的行为。但这种简单化可能就会存在对人性的片面解释与概括。实际上,在现实的分析中我们还需要放宽假设的真实分析,这种分析可能由于无法抽象概括,而导致无法进行程序式决策来概括,但现实中仍有很多人行为决策问题可能借助于简单的非程序式决策会取得更好效果。

注释：

- [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阿莱命名的一个实验结果,实验发现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是决策论中的一个悖论。出现阿莱悖论的原因是确定效应(Certain effect),即人在决策时,对结果确定的现象过度重视。
- [2] 股权溢价之谜(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最早由梅赫拉(Rajnish Mehra)与普雷斯科特(Prescott)于1985年提出,他们研究发现人们在决策时风险厌恶实际比传统认为的高。
- [3] 羊群效应是指人们经常受到多数人影响,而跟从大众的思想或行为,也被称为“从众效应”。
- [4]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不变的。但现实中人们的偏好并不是连续的、稳定的,而是可变的。偏好颠倒的现象说明,人们并不拥有事先定义好的、连续稳定的偏好,偏好是在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受判断和选择的背景、程序的影响。
- [5] “满意”原则,就是能够满足合理目标要求的决策,满意原则是针对“最优化”原则提出来的。“最优化”的理论假设把决策者作为完全理性的人,以“绝对的理性”为指导,按最优化准则行事。但是,处于复杂多变环境中的企业和决策者,要对未来做出“绝对理性”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因此,决策者不可能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只能做到满意决策。
- [6] 西蒙的《管理行为》被誉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典著作”,它是社会科学思想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大作。作者对于决策过程的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他也是管理方面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他的理论已经渗透到管理学的不同分支,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石之一。
- [7] 《西蒙选集》,26-45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8] 见靳涛:《诺贝尔殿堂里的管理学大师——赫尔伯特·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5。

- [9] 见靳涛：《诺贝尔殿堂里的管理学大师——赫尔伯特·西蒙》，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5页。
- [10]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1961年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他拥有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头衔。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是该大学第3名获诺贝尔奖的教授。
- [11]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在10月9日公布。两位获奖者分别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卡尼曼的主要贡献时指出，丹尼尔·卡尼曼是“因为将心理学研究结合到经济学中，特别是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10月9日，当卡尼曼得知自己获奖消息后，十分激动，以至于把自己反锁到屋外，后来不得不破窗而入。他说，“得奖是对行为经济学研究者的认可”。当天，在近200名师生为他举行的庆功会上，他高兴之余，“还有一点伤感”。因为他长期的研究伙伴阿莫斯·特沃斯基已于1996年去世了。
- [12] 李增刚：《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的基础》，《经济评论》2003年(2)。
- [13] 引自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第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4] 期权微笑指期权隐含波动率与行权价格之间的关系。对于股票期权来说，行权价格越高，波动率越小，当行权价趋于正无限时，看涨期权价格趋近于0，看跌趋近于正无限，波动率均趋近于0；而对于汇率期权来说，则行权价越接近现价，波动率越小。
- [15] 拇指规则又叫“经验法则”，是一种可用于许多情况的简单的，经验性的，探索性的但不是很准确的原则。
- [16] 刘仲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国际金融报》2002年10月11日。
- [17]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8] 黄卓、姚伟：《主流经济学挑战者的福音》，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2003打印稿。
- [19] 黄晴：《经济札记：经济学向心理学靠拢》，《人民日报》2001年3月13日。
- [20]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47页，中国编译局出版社1999年版。
- [21] 威尔士于1999年10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稿，《哲学的发展：今天和未来》张敦敏译。
- [22]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4(4)。
- [23]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序言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24]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 [1] 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 [2] 西蒙.西蒙选集[M].黄涛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 [3] 靳涛.诺贝尔殿堂里的管理学大师——赫尔伯特·西蒙[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 [4] 李增刚.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的基础[J].经济评论,2003.
- [5]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 刘仲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N].国际金融报,2002-10-11.
- [7] 黄卓,姚伟.“主流经济学挑战者的福音”,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2003打印稿.
- [8] 黄晴.经济札记:经济学向心理学靠拢[N].人民日报,2001-03-13.
- [9]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国编译局出版社,1999.
- [10] 威尔士于1999年10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演稿,“哲学的发展:今天和未来”张敦敏译.
- [11]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J].南开经济研究,2004(4).
- [12] 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J].经济研究,1995(10).
- [13] 施马兰西,R.D.威利格主编.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M].李文溥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